

## **Summary of the article entitled “关系资源与地位优势的传递”**

Xie, Ailei. (2010). Guanxi resourc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dvantage and college access in rural China. *China Rural Studies*(2), 272-297.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f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With respect to college acces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market reforms have reproduced the advantages of students from the cadre families while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new arising economic elites. Yet, it has done less for traditional peasant families whose children still fail to gain access to college in proportions higher than their size of the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placed a special emphasis on h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become the main influences on rural students' college access. The process dimension -- how families from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within rural society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schooling of their children and how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inequality of college access within rural society, is investigated through field research in a poor rural county. This research unpacks this process by examining the school involvement experience of parents in Zongyang, a county located in the province of Anhui.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h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become converted to social capital as part of families' strategies within the increasingly stratified social context of rural China.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the consequences of activ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networks within family and community, and also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to facilitate this process of gaining advantages in access to college during the secondary school segment of rural education. Household interviews and field notes were used as the main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which involved a range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The data analysis suggests that state, schools and teachers provide few formal and routine channels for rural parents to get involved in schooling, despite of their overall willingness to help their children to achieve school success. This elevate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ies' strategic initiatives to employ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guanxi) within family, community and between school and family. Parents from cadres backgrounds are 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ese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that are useful to their children's chances of entering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ttending rural secondary school.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new economic elites' backgrounds, have developed the means to capitalize upon their families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by converting them into social capital that creates advantages in college access for their children. Peasants, however, rely heavily on teachers and relatives in education and are substantially marginalized from those important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of capital conversion.

Although this research found the structure constrains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 of peasant familie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agency of parent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For example, it found, in some cases, that peasants actively uses their kinships to create chances for school involvement that can potentially improve the chances of their children's college access.

This research brings to the forefron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eed to underst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within rural society as it determines the chances of attaining college access b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t is also one of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conversion in affecting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post-socialist era, which helps to re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reforms over rural education systems.

中國農村研究

CHINA RURAL  
STUDIES



(李春玲, 2005; 李强, 2004, 2005; 陆学艺, 2002)。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下, 农村居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中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市场化改革后, 这种不利位置所带来的“马太效应”, 更使他们面临着诸多的教育困境。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以及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 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 它使得普通高校逐渐具备服务于更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能力 (Postiglione & Aitei, 2009)。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大众, 管理者与研究者的目光吸引至农村, 聚焦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张给农村居民所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差异及其给农村居民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所带来的限制。他们发现, 自从普通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以来, 虽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绝对数上有所增长, 但是, 比起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的相对弱势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 (Jiang, 2007; Xie & Luo, 2004; Yang, 2006)。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以及社会资源与地位分配机制的重大变化 (Nee, 1996; 李路路, 2002), 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分层现象, 并初步探讨了这种分层给农村居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发现, 市场化改革虽然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扩张, 但是, 新增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并不公平。从研究结果来看, 它强化了来自传统的再分配精英 (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 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 (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家庭的子女的大学入学优势。而来自农村社会的一般农业劳动者, 其大学入学弱势仍然明显 (Jingming, 2007; Yang, 2006)。

上述描述性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市场化改革, 以及中国高教事业的发展给农村居民带来的一些机遇与困境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 问题在于, 这些研究多将目光聚焦于城乡之间的差异, 而很少关注市场化改革以及农村社会内部的分层现实及其对农村居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此, 更多的研究可以在视角上实现新的转向, 以发现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来的潜藏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格局背后的新的动力机制。在本研究中, 笔者将视角转向农村社会内部, 聚焦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层及其对农村居民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通过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 笔者将解释精英是如何通过关系资源的运作来将自身的资本 (经济、文化以及社会) 的优势转变为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 而一般的农民所面临的资本困境, 又如何制约了他们为保证子女的教育机会所可能采用的行动策略。

**关键词:** 市场转型 社会分层 关系 社会资本 高等教育机会

## 一 背景与问题

1970 年代末期以来的市场化改革, 给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也使得不同的个体在收入、声望等方面有了显著的差异。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下, 农村居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中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市场化改革后, 这种不利位置所带来的“马太效应”, 更使他们面临着诸多的教育困境。既有的研究对这些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不过, 这些研究多将目光聚焦于城乡之间的差异, 很少关注农村社会内部的分层现实。

在本研究中, 笔者将视角转向农村社会内部, 聚焦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层及其对农村居民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通过对中部省份阳县所作的调研资料进行的初步分析以及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 笔者将解释精英是如何通过关系资源的运作来将自身的资本 (经济、文化以及社会) 的优势转变为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 而一般的农民所面临的资本困境, 又如何制约了他们为保证子女的教育机会所可能采用的行动策略。

## 关系资源与地位优势的传递

——一项对 A 省 D 县农村居民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考察

谢爱磊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 二 理论视角

在不少针对大陆转型问题的研究中，关系资源的动员和使用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一项重要策略。可以动员的关系资源的数量被看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或者社会地位差异的一项重要解释性因素(Bian, Lin, 1995)。研究者认为，关系资源的重要意义，不仅来自于关系在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亦更由于当前独特的历史和制度转型给运作所带来的可能条件(Gold, Guthrie, & Wank, 2002)。

尽管在当前的语境中，对“关系”一词的意义褒贬不一，在本研究笔者将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对“关系”概念进行重新的解读和使用。为，关系是理解普通人的教育机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一般意义上，我关系理解为个体之间的联系、链接。它之所以能够对个人的生活境遇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人际网络本身即含有或者能够传递某些重要的(Gold, et al., 2002)。这种分析思路正切合社会资本概念对人际间连接的概括。布迪厄(1986)将社会资本看做是镶嵌在制度化的网络中的实在或潜在的资源，在他看来，个体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多少取个体社会资本的规模以及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多少(经济的抑或文化科尔曼(1988)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并且有利于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在他看社会资本有多重形式——规范和期望，人际间的信任以及通过社会网传递的信息等都可以看做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尽管社会学家们对资本的概念理解不一，但是，他们要通过社会资本传达的核心思想却同之处(谢爱磊, 2009)第一，社会资本描述的是个体之间的网络以及不同模式的网络连接可能给个体所能带来的收益；至于个体究竟从其网络连接中获得何种收益，则端赖于网络的结构特点。社会资本所要传达的第二项核心思想在于：由不同的连接所联系起来的个体有定的行动能力，能够利用自身的网络来使用可能的资源，当然，处于社会位置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动员自己社会关系的能力。

学校间的网络连接性质对于学习者的影响非常重，例如：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连接如果密切，也就是说，假如此母能够在孩子的学习事务上投入更多的关注(如检查或帮助孩子的家庭作业，控制孩子看电视)，那么孩子则更有可能获得好的学习成就(Coleman, 1988)；社区中的家长假如能够彼此多就孩子的情况进行交流，并合力控制不良的社会情况(青少年犯罪)，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少受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假如家长与学校能够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么彼此间便有可能互通信息，共同帮助孩子解决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在本研究中，借用“关系”一词来描述存在于人际间的网络联系及其所潜藏的资本含义。笔者认为，关系一词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住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条件下的社会资本的可能含义与特征。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个人通过“关系”与社会取得联系，并得以不断地塑造自我(梁漱溟, 2003)。更重要的，在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关系的确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人关系连接的特点也使得社会资本的配置呈现出特定的态势(Gold, et al., 2002)。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出一种水波纹式的“差序格局”。这种关系模式，使得中国人际间网络连接的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Xiaotong, 1979)。而关系的远近，也意味着彼此间义务的性质——熟人，关系亲近的人(强关系)往往是普通人最愿意求助、最值得信赖的人，而一般的弱关系，则非如此。

在中国的语境下，社会网络连接的如此态势，使得普通家庭在使用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教育优势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强关系”与“弱关系”在农村学生的教育经历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在动员“强关系”或者“弱关系”时各自究竟有着何种优势或者感知着怎样的困境？我们需要倾听来自不同背景家庭的声音。

##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要着重了解的是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长在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教育机会时，所可能使用的“关系策略”或所面临的“关系困境”。对他们经历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他们所感知的那些来自社会的结构性限制的

解，需要以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深度描述，以及与他们的深入交流为基。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的是定性研究。具体实地调研工作在2008年月至2009年3月、2009年8月至2009年12月间展开，持续时间为7月。研究地点：斯宾瑟（1973）认为，实地调研工作的开展，不只是进研究地点那么简单，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接触到的是个人和文档。因此，选择研究地点时，研究者应当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首先，研究地点应能够满足研究者个人的研究需求；其次，在有限的时间和研究资源的约束下，研究者应当能够考虑他们能否清楚地了解研究地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点可能受制于研究地点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以及社会的复杂程度。最后，研究者能够有便利的条件和手段同研究地点的人进行接触与进一步的交流。

而这些正是本文选择该县作为调研地点的主要原因。该县位于A省南部，人口的大部分为农村人口，由于本次调研的主要对象为农村居民，就得接触研究对象变得较为容易。根据该县所隶属的市的统计资料，农村居民占该县人口的近90%，并且近10年来，农村居民的比例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见表1）。从规模上来说，该县的教育系统也是较适中的。据2007年该县政府主页的报道，

（当年）共有11,609人参加高考，其中有599人被一本院校录取，1,595人被二本院校录取。

年 份	H 县人口：1997—2006 年		农  村  人  口 (%)
	总 人  口	农  村  人  口	
1997	94.00	89.00	
1999	94.60	89.70	
2001	96.00	90.00	
2003	96.00	89.00	
2005	96.20	88.10	
2006	96.00	85.00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相对有限的学校系统规模，使得笔者在选择部分学校的毕业生进行访谈时，更为便利。最后，笔者也出生于该县，高中阶段之前一直在本地接受教育，熟悉本地人文与社会环境，更重要的，笔者熟悉本地的方言，这些都为笔者持续深入地进行访谈工作带来优越的条件。

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的工作中，我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法和访谈法。在本研究中，文献法是了解该县社会与教育背景的主要手段。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使用了两类文献，第一类是官方的统计年鉴以及地方志；第二类是地方性的报纸以及该地方相关部门的网络报道。通过对这两类文献的分析，我主要了解的是该地区社会与教育发展的一般性状况，以及该地区所执行的一些教育政策。对受访者日常生活经历与他们对这些经历的看法的了解，需要依赖访谈法。在本研究中，笔者力图理解的是，来自不同背景家庭的家长，在对子女教育事务的关注以及同学校的联系方面，到底呈现出何种不同的态势，又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对在家中给予子女辅导，监督等方面到底持何种看法；他们对与学校保持联系方面又持怎样的看法。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又呈现出何种相同与不同之处。

在访谈的初始阶段，笔者主要采用的是开放式的访谈，在访谈的后一阶段采用的主要半开放式的访谈。同干部，企业主人等人的访谈显得较为正式，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更为工业化时代和科层制时代的规则所影响，因此和他们交流的机会少，一般只能和他们见面一或两次，每次访谈时间持续在半小时至1小时之间。同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一般对谈话录音，以方便自己后期的资料整理工作。由于住在当地，同普通农民的访谈，一般都进行多次，很少采用录音的方式，一般都是事后笔录整理，生活在农民中间，给了我很多便利，有时的谈话只是短短几分钟，长的也不过半个小时。更长时间的谈话，内容涉及的往往超出研究范围，但正是在这样的日常交往中，我们才变为熟人，才能彼此分享最诚挚的感受——费孝通曾断言中国的乡村社会为熟人社会，这一点毫不为虚，在研究的过程中，访问者与受访者越熟悉，他们越愿意坦诚的交流。

比较起那些“有单位”的党政干部或者企业主，同农民的访谈稍为复杂，大部分农民常年外出打工。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笔者刻意将访

时间放在春节期间（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和农忙（以及2009年8月至2009年12月间）这两个关键时间段，在这两个时间段，他们中的大都回家过节或者收割庄稼，因而我能够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期间，访谈工作进行地稍微艰难，因为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干活。这样，我就必须在他们较为空闲的时间找到他们，一般是清晨之前，中午吃饭时间，或者晚上。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还对来自部分的学生进行了访谈，也走访了部分学校，以求证信息。

本报告初步发现，主要是以调研工作前期（2008年12月至2009年月）的部分访谈为基础。在这段时间，笔者共对15个家庭进行了访谈，在表2中，对受访者的家庭基本情况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情况进行总。

## 2 受访者及其子女学业情况基本信息

家庭背景①	父亲受教育程度	自我汇报的年毛收入	孩子数目	孩子上学情况
干部（乡政府部门领导）	大专	3至4万元	1	1.一本院校录取
干部（乡政府部门领导）	大专	3至4万元	1	1.二本院校录取
技术人员（教师）	大专	2至3万元	2	1.一本院校录取 2.一本院校录取
技术人员（教师）	大专	2至3万元	1	1.一本院校录取
个体户	初中	2至3万元	1	1.一本院校录取
个体户	初中	2至3万元	2	1.二本院校录取 2.二本院校录取
私营企业主	初中	8至9万元	2	1.一本院校录取 2.在校高中生
私营企业主	初中	5至6万元	2	1.高中在读 2.高中在读
一般农民（外出打工）	无	1至2万元	2	1.初中毕业后打工 2.高录取
一般农民（外出打工）	无	1至2万元	2	1.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2.初中在读

以家庭中男性所从事的职业为准。

续表2

代码	家庭背景	父亲受教育程度	自我汇报的年毛收入	孩子数目	孩子上学情况
11	一般农民（外出打工）	无	1至2万元	3	1.初中毕业后打工 2.初中在读 3.小学在读
12	一般农民（外出打工）	小学	1至2万元	2	1.一本院校录取 2.初中在读
13	一般农民（外出打工）	小学	1至2万元	3	1.初中毕业后打工
14	一般农民（在家务农）	初中	低于1万元	1	1.初中毕业后打工
15	一般农民（在家务农）	小学	低于1万元	1	1.职高肄业

## 四 初步的发现

### 背景描述1：H县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层

本次调研的地点选在中部A省的H县。该县位于A省西南部、地接长江，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如同长江中下游的其他县一样，丘陵冈冲，河流纵横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该县具有发展农业与渔业的独厚条件。该县县志记载：

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为低山区，西北部为低丘漫冈，中部是大牙交错的丘陵冈冲，东南部属沿江洲圩。……长江流经县域74.5公里，通江湖泊有\*\*湖、\*\*湖、\*\*湖等。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达，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水上运输均构成得天独厚的优势。

该县农业发达，一方面是由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还得益于其优越的气候环境。

H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气候变化明显。年均气温16.5℃，年均积温5129℃。冬季低温而无严寒；春季温和；夏季温度虽高但不酷热；秋季略高于春温。由于季风环流和地形影响，县境

冬季多北风，春秋多东北风，夏季多东南风。年均降水量1326.5毫米，冬季降水量少，夏季雨量集中，约占全年总量40%。

一年四季的气候条件，大部分都有利于农业生产。农业也自然成为当从事的主要产业。至今，农业人口在当地的总就业人口中仍然占大（见表2），农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该县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况直些年才有所改变（见图1-2）。

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实施较为平均化的再分配政策，劳动者内部收入差异并不明显（李秀兰，2001）。1978年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及推广，以及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迅速的变化，H县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该县的城镇集体经济和私营以及个体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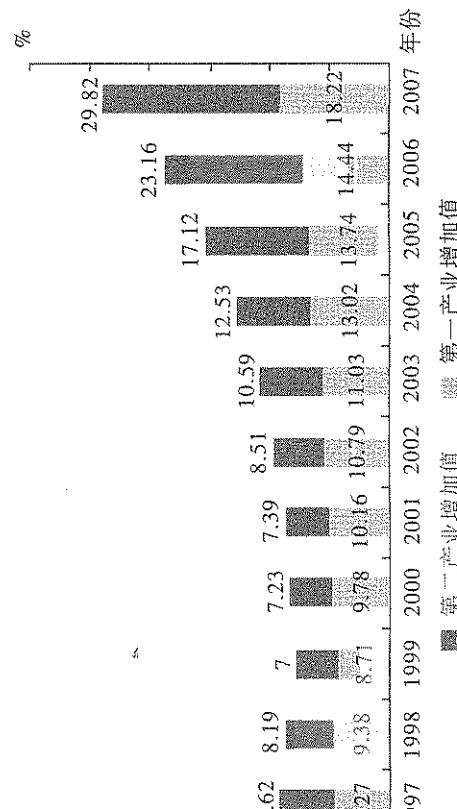


图1 H县的经济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普通居民间的收入开始有了显著差异。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及其变化，理论界有不少论述。尽管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施的是平均的社会政策，但是，研究者依然认为，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层次边燕杰、卢汉龙 & 孙立平，2002）。这种分层在农村社会主要体现为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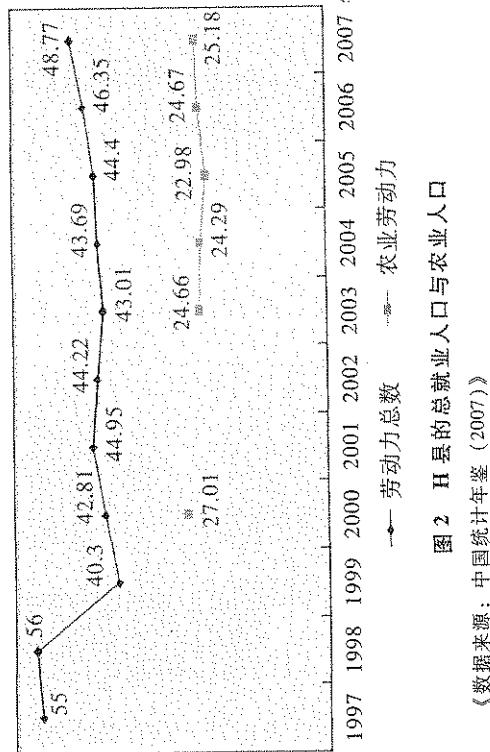


图2 H县的总就业人口与农业人口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分配精英（党政干部、技术人员）与农民两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性。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研究者认为拥有人力资本优势的新型经济精英（包括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也逐渐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优势地位。在笔者调研的H县，趋势正是如此——通过对该县来自不同类型单位以及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分析，在代表传统优势阶层的国有单位（企业、事业、机关）中以及代表新型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优势阶层的乡镇企业单位<sup>①</sup>，其工资水平比一般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都要高。在前文中，笔者曾对前期接受访谈的15户家庭的部分情况进行了统计。从自我报告的毛收入情况来看，其分层状况也基本上符合相关统计资料所揭示的结果。

虽然说，收入并不是决定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因素，但是，根据相关的收入方面的统计数据，可见社会分层的一般性趋势。这也正符合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看法——传统的再分配精英其优势地位获得维持，而新型的经济精英也正在崛起。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则由于诸多结构性的限制，在收入以及其他可动员的社会资源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图3）。

<sup>①</sup> 假如有全局性的统计资料来详细说明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状况，对于H县收入分层的描述应当更为详尽。

## 高等教育机会。

## 背景描述 2：H 县的学校分布与择校

研究者认为，户籍制度与教育城乡资源分配的三元格局是影响普通人教育机会的第一重制度因素。改革开放之后，户籍制度虽然在逐步松动，但是，它并没有实质性的重大改变，对普通人的教育机会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地处边远农村的居民而言（Postiglione, 2004），尽管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力量不断减弱，它却限制了学生在异地接受初、中等教育可能性（范先佐, 2005）。同样制约普通人的教育机会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城乡二元的分配格局使得一般的农村居民无法接受足以与城市的教育资源。不仅如此，在农村社会化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逻辑也呈现出一定的政治逻辑，在数量和质量呈现出“县—乡—村”的逐渐递减的分配格局（Yang, 2006）。在笔者调研的 H 县，除其所在地的市级电大在当地所设的电大教学点外，没有任何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教育系统中，主要包含的学校类型有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其中高级职业中学 3 所，普通高中 12 所，普通初中 60 所，小学 324 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原则上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H 县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中心学校管理制度，拥有较强师资的中心初等学校或小学都坐落在当地的行政中心——县或者乡政府所在地。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在普通高级中学的选址上也有所体现，H 县普通高级中学一般都坐落在县城，或者乡政府所在地（1 所中学除外），其中省级示范中学坐落在县政府所在地，市级示范中学坐落在 H 县几个下属乡政府所在地。

图 3 大陆农村社会分层

资料来源：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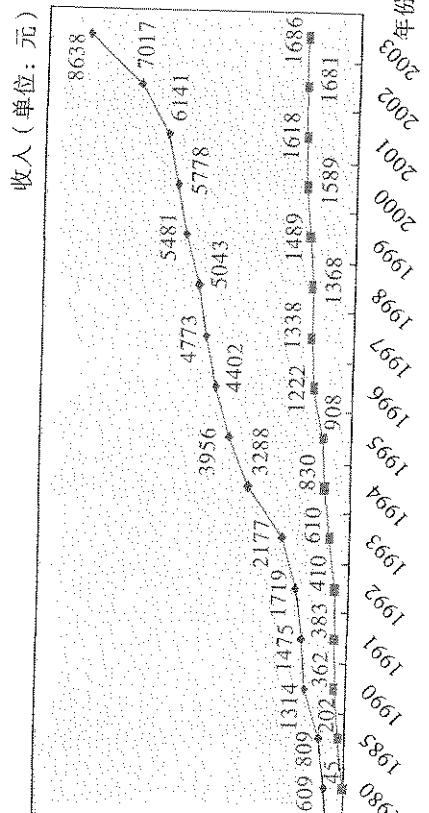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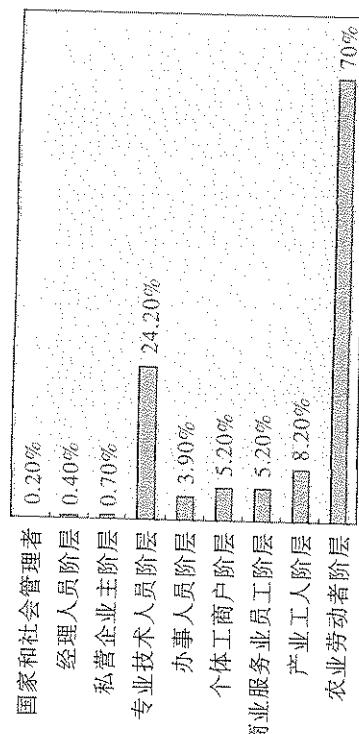


图 4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与一般农民纯收入  
资料来源：##地方志 2004。

人上述分析看到，农村社会内部已非均质性的群体，不同的家庭在动用的资源投资子女教育时显然有着不同的能力。而此项研究即意探讨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如何能够影响不同家庭子女的

教育筛选模式的变化被认为影响普通人的教育机会的第二重制度性因素（Zhou & Hou, 1999）。1977 年，停止了 11 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在教育系统中，“绩效原则”亦成为各类学校招生的重要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要素逐渐成为影响学校招生的一项因素（李煜，2006）。在笔者所调研的 H 县，其情况正是如此，虽然 H 县的普通高中招

策规定择校生的规模逐年递减，而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不同类型择校生规模的确实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时至2009年，各普通高学依然预留了30%的名额给择校生。接受访谈的一位中学教师谈到招生首先需要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此基础上，他们的家庭需要缴纳一费用以求得进入某所学校“资格”。但是，部分有择校经历的家长们说关系资源的动员在此过程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的分层和教育系统的变革是本研究展开的背景因素。教育筛选会“分数”与“择校”双重模式的存在，使得普通家庭在争取教育机会面临着双重的策略选择，第一，他们需要创造条件，为子女创造好的环境，赢得更好的智力刺激环境，从而帮助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数，以他们一级一级地进入优质的学校，最后获得高考的成功；第二，他们在子女成绩稍不如意的情况下，动用家庭的经济和关系资源帮助孩子更优质的学校。而社会的分层则使得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在这双重策选择中面临着不同的优势与困境。

#### 发现1：关系的价值与使用：阶层差异

我们视家庭内部的关系为一种强关系，不少研究者认为，孩子与父母习事务上所产生的交集对孩子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在H县的调查表明，家长们对此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他们一般都认为，保持对孩子的监督与管理，是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成绩的必要条件。

一位从事个体经营的家长（受访家庭编号6）就提到：

我自己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了。我想我唯一能帮到我孩子的就是监督他学习，让他不要玩物丧志。所以他放学后，我每天都尽量地去督促他学习。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管自己。他们喜欢看电视，如果不管，就整天坐在电视机前了。

他的孩子也提到：

当然，我爸爸看着我有用。例如，假如我看电视的话，他就不高兴了，有时间还责怪我，甚至打我。我也知道，要是在学校里表现不好的话，回家的话，老爸肯定要不高兴。我确实电视看得少点了……

必要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学业指导，对子女的学习帮助更大。

一位教师（受访编号3）就提到自身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优势：我有两个孩子，我的妻子和我都是初中老师，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花太多时间管教他们。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培养他们好的学习习惯，让他们自律起来。我让这两个孩子每天一起学习，有时候我们也会教他们一些问题。

父母与子女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也有助于孩子获得情感性的支持。

一位来自干部家庭的家长（受访家庭编号2）说道：

我孩子，……小（初中的）时候……他当时是学习小组的小组长——大概老师当初的想法是想利用这个东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后来）就把她撤掉了，撤了以后，她回家……就在我（身）边哭，（然后一）边讲，我就问……撤了什么原因？是你学习成绩不行？还是你与人交流不行？还是你没有把那个组给管理好？她说没有什公原因，就是好像父母对她不够重视，这就把我的组长撤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我说撤了没有关系，把你组长撤了以后，你自己以后还可以做班长，你把这个心态平衡好，就没有什公大关系。你现在目的是要把学习成绩搞好，而不是要当什么官。讲讲以后，我孩子接受了，后来就好了。

尽管所有的家长都认为，维持父母与孩子在学习事务上的联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维持这种互动关系，社会背景不同，孩子与父母间的联系明显不同。通过访谈资料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出，来自传统的再分配精英和新型经济精英（干部、技术人员或者私企、个体工商户背景）家庭的家长，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更有可能在家，也更有可能与孩子在学习事务上保持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尽管通过对定性访谈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的量化分析并不能够作推测更广范围的相应背景的人口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孩子与父母间关系的态势在农村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从全国性以及该地区县级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看米，一般的农民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干部、技术人员或私企与个体工商户。外面的世界精彩，外在的经济机遇正驱使更多的农民走出自己的家乡，而他们的“二”，则成为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照看的环境。在同当地农村一所小学校与攀谈中，他提及：

我们学校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要么自己照顾自己，要么是有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父母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根本没有办法照看自己的孩子。爷爷奶奶的隔代教养，也使这些孩子不太听话。

### 3 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情况

	父母都在家	父亲或母亲在家	父母都外出打工
分配精英新的 经济精英家庭	8	0	0
一般农民家庭	2	3	2

这种“大部人都外出打工的现象”在当地的地方志中也有提及：

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流出境外半年以上人口为226201人。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近6倍。外出流动人口中青壮年所占比例较大，15—44岁的外出人口为174514人，占外出总人口的84.08%……

另外，据该县2003年《农村住户调查基本情况》的统计，在接受调查230户共940人中，有劳动力619人外出打工，占总接受调查人口9%。

比较一般的农民家庭，来自再分配精英或者新型经济精英家庭的家长可能长期在家，他们一般有稳定的职业和不错的收入，少有外出打工与意愿。在这些家庭里，家庭关系保存的较为完整，父母能够在放督与管理孩子的学习。

一位从事个体经营的家长（受访家庭编号5）就提到：

我发现我的许多邻居都外出打工了。他们的孩子都在家，却没有人照顾。有时候我甚至发现这些孩子深夜还在打扑克。许多人都上了大学，因为他们整天就知道玩。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必须待在家，照看孩子，多注意孩子的学习。

相较于而言，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孩子，劣势明显。尤其是那些常年外出打工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长期处于无人照料，无人管理的状况。一个初中过后，由于中考失利未被录取入高中，最后被一职业中专录取的女孩告诉我：

我的爸妈到城市里去打工。他们各找了一份工作，平时很少回来。他们对我在家或者在学校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我平时在家很少看书，也没有人管我。遇到什么（学业上）问题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的爸爸也想了一些办法，让我没有办法玩，比方说，他拆了家里的电视机，让我看不了电视，但是，这没有用，我还是能到同学家去看电视。

一般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体现在他们无法维持家庭内关系的完整，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动员外部的弱关系，为孩子的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首先体现在为孩子争取重点中学的教育机上。该县的中等教育机构分层明显，在高中教育阶段，省、市与一般学校的升学率呈现明显的倒金字塔状态——省级示范中学的高考升学率高于市级示范中学，而市级示范中学又远高于一般中学（见表4、表5）。

表4 2007年三所不同类型中学的本科录取率（学校名简化名） (%)

学 校	应届生录取率	历届生录取率	总升学率
山顶中学（原省重点）	65.20	69.40	67.10
县一中（原市重点）	47.30	66.90	55.70
渡口中学（原一般）	17.30	36.80	23.10

2008年三所不同类型中学的升学比较表（学校名简化）							(人)
学 校	一 本	二 本	三 本	一 本	二 本	三 本	历 届
一中（原省重点）	257	516	592	172	494	578	
二中（原市重点）	38	180	266	77	376	484	
三中（原一般）	6	24	45	8	90	132	

由此，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呈现高竞争性的态势，关系资源的功用，成为不同家庭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一项重要策略。这点在重点高级中学入学机会的争取上体现尤为明显。正如上文所提，虽然日县的普通中招生政策规定普通高级中学择校生的规模需逐年递减，但时至2009年，各普通高级中学依然预留了30%的名额给择校生。部分有择校经历的家长们坦言，关系资源的动员在此过程中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位教师（受访家庭编号3）提及自己动员关系为孩子择校：

我听说我们县之外的一所学校挺好的，就让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帮我的孩子去争取个名额。他到这所学校的时候，分数很高，学费都免了。但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学校不行，我的孩子说那里的学习环境不好，不适应。后来，我就让我的一个学生把我孩子弄到山顶中学。

这种经历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而言，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他们进入某类学校的唯一“资源”。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受访家庭编号11）就说到：

假如我认识学校里的谁，比方说校长，我也许就能帮助我的孩子上高中了。她那年如果能够找人买到的话（按择校的分数来择校），还是能上高中的，后来觉得没有希望了（找不到人），成绩又不是非常好，便放弃了，她最后就去温州做事（打工）了。

农民的动员弱关系方面的劣势，并不只是体现在“择校”上，也体现在家长维持学校与家庭的联系上。

家长们都认为同学校中教师或者其他人员的联系，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孩子学业情况的渠道。对急剧变革的农村社会而言，这点尤其重要。因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初步发展，推动了学校周边环境的迅速改变，学校周围环境的恶化，网吧与游戏厅林立，怎样使孩子免受这些外界环境的影响，成为一般家长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当地一所省级示范中学于2008年12月18日出版的校报上所刊的《校园封闭管理，向纵深推进》一文正反应了这种困境：

本学期以来，我校实施校园封闭式管理，狠抓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社会反应良好……（学生）上课期间非经批准不得离校。管好了大门，就堵住了是非的“口子”。……并坚持每晚的就寝查铺……（学校）积极寻求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主动联系和配合文化局、电视台……等部门，集中整治一批校园周围的违规网吧、游戏厅、录像厅……减少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文化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和诱惑……

而正如上文所提，农村学校，尤其是高级中学一般都坐落在县或者乡政府的所在地。远离一般学生家庭。除家住学校附近的居民外，一般家庭的家长都倾向于让自己的子女住校。住校之后，家长们一般无法继续监督孩子的学业。不少家长更是常年在外打工，与学校的联系极少。他们无法与教师形成一致的力量以督促孩子的学习，使他们免受学校周边“恶劣”（家长语）环境的影响。

一位家长（受访家庭编号10）提到：

我孩子初中的成绩都好好的，但是上高中之后，问题就出来了。他喜欢上网，他一出校门，老师又管不住。我们自己又常年在外打工，根本不知道，他是学习还是不学习。没办法管他。

家长与学校间的联系也是家长获得孩子学习状况的重要渠道，通过经常性的信息交流，使他们能掌控孩子的学习状况，甚至为孩子的学习提供有意义的信息。一位私企主（受访家庭编号8）就提到：

我有个亲戚在高中做校长，尽管他不是在我女儿的学校工作，但是，他认识这个教育系统的所有人，包括老师。他经常给我女儿的老师打电话。这样，我就知道许多我女儿学习的情况，包括她的成绩，各科的表现。必要的时候，我会根据得到的信息，告诉女儿该怎么办。

但是一般的农村居民很少能够与学校保持紧密的联系。通过对访谈数据的量化分析，我发现，一般的农民很少与教师和学校保持联系。而来自家庭的家长与学校的教师保持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受访的 7 位农民中，只有 1 位说，他与班主任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而接受访谈的其他家庭背景的受访者则报告说，他们与教师一般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上述一般性的描述，使我们认识到，在孩子的学习事务上，强或者弱，系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价值，一般的农民与优势阶层（传统上的再分清家庭与新型的经济精英家庭）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问题是，正如所言，不论是一般的农民还是来自优势阶层的家庭，都认为关系有着的作用——对孩子的监督与辅导以及与学校保持一定的联系可能有助于孩子的学习。但是，一般的农民为何没有这样做，其原因是？在关动员上，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到底存在着何种优势与弱势？

发现 2：动员“关系”的“优势”与“弱势”：阶层差异  
当被问及为何不设法照看孩子并给予孩子一定的监督与辅导时，一般受访者的回答是：“经济压力”。  
由于通过农业耕作赚取的收入有限，为了贴补家用与开支，当地的农民中，有 5 户常年在外打工，每年在家居住时间不超过 2 个月。由于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的子女一般无法进入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正规学校，只能交由生活在家乡的祖辈照顾。如果放弃打工的机会，在家照顾孩子，对他们来说，将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在接受笔者访谈的 10 号家庭中，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父母都常年在外，孩子们则缺乏必要的监督，男性户主提到：

女儿经常看电视，成绩不好，后来进入一所职业学校学习。

他说他很早注意到了女儿的学习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两难困境：

我必需外出工作，不然的话，假如我的孩子考上高中，或者考上大学，还得花钱，那就没有办法供他们了。但是，假如外出打工的话，他们就没有人管，我妈妈在家管他们，没有什么用，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自己管自己。

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

自己和爱人一年外出打工挣的钱加起来不过 2 万左右，而一家人一年加起来要超过 1 万，假如留爱人在家照看孩子，收入减少很多，就不会再有任何结余。那么孩子们以后的学习经费将无法得以保证。

这也是一般的农民无法与教师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外出打工，除电话外，没有其他与教师保持密切的、经常性的联系的渠道。而来自乡干部家庭、技术人员家庭或者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家长则显得更为有利，他们由于有稳定的收入而无需外出打工，可以与教师保持较为持久的联系。

文化知识的缺乏也是导致一般农民不能够辅导子女和无法与教师保持沟通的重要原因。在笔者访谈的 H 县，一般的农民接受的学校教育都比较少，2000 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 6 岁以上（含 6 岁，下同）人口 777218 人，识字的 450070 人，占 6 岁以上人口总数的 57.8%，其中大学（含大专）文化程度 2597 人，高中（含中专）34311 人，初中 127721 人，小学 286513 人。县内 12 周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有 310811 人，占总人口的 34.9%……县内男性文化程度高于女性文化程度。全县识字的 450070 人中，女性有 152105 人，占识字总数的 34%。

这在访谈对象中也有所体现，在接受访谈的7位农民中，有男性6位1位，其中只有4位男性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由于文化水平低，他们一般无法给予自己的子女以学业辅导，在受访位农民中，仅有1位提及自己曾经辅导过孩子的功课，但是：

到了初中，自己就什么都不懂，就没办法再教了。

相对而言，接受访谈的所有来自干部和技术人员家庭的家长都回答自己能够在家中给予孩子以一定的指导。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接受过或者接受过很少的教育，没有体验过孩子经历的学校教育，他们不知道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可以给予何助，也不知道可以如何同教师打交道；在同教师联系的过程中，又可问哪些内容。受访的所有农民家长都回忆说，他们每次与教师的交谈都很短。谈论的内容也仅限于孩子的总体成绩怎样，是否有希望考上。

比较他们，受访的来自干部或技术人员家庭背景的家长则回答说，谈论的内容广泛。一位干部（受访家庭编号1）就提到：

我每次问老师，除了问总体成绩外，就是各科成绩怎样，有没有上升的空间，有没有办法改进（她的学习）。我可以（为孩子）做哪些工作……

一般农民与学校的教师保持联系较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有联系网络以及传统的关系偏好对他们的关系动员能力的约束。大部分受访答说他们无法与学校的教师保持连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校里“熟人”。熟人主要指亲戚、朋友这类与自己有着强关系连接的人。农民仍然习惯于传统的交往方式，在有序的“差序格局”中，亲缘关系仍然是他们动员社会关系的首选网络。正是由于这些选择上的偏好也们与教师的联系偏少。在教师不是他们的“熟人”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关系网络不值得信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办法联系”。一位农民受访者（受访家庭编号14）就提到：

学校的老师都不是我的熟人，我不知道找谁谈比较好。他们都不熟，又不是亲戚，不贴心。

当要求说明“不贴心”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

我要是要求老师给孩子多给些关照，不是亲戚、熟人的话，他们哪里愿意。

他的想法在所有受访者的谈话中都有所体现——当然包括那些来自干部、技术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家长。

一位干部受访者（受访家庭编号2）就提到：

我和老师比较熟悉，熟悉的话，你请他们给你的孩子调个座位（放到班级靠前的位置），或者平时给孩子更多的关注，都好说话了，有了问题也能够帮助孩子及时处理。

但是，相较一般农村居民而言，党政干部，私营企业主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家庭关系网络则大得多。他们由于工作单位或者家庭住址的缘故，拥有多重的、更广阔的关系网络，除亲戚之外，他们可求助的“熟人”更多，因而，有更多的与教师成为熟人的机会。传统的学校布局——将学校放在乡镇的做法——也使得来自优势阶层的家庭更有机会与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乡干部与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家庭一般在乡镇工作或者营业，他们与教师关系热络，接触的机会也多。他们更可能与教师结成紧密的圈子，督促孩子的学习。

接受访谈的一位个体工商户（受访家庭编号6）就提到：

我在这边（乡街道）开店，和老师都认识，他们和我也比较熟悉，孩子要是玩游戏或者上网，老师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赶去（管住孩子）……和老师都熟悉，我去学校问问老师孩子成绩和表现的次数也多……和他们沟通、交流得多……

## 小 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市场化改革导致农村社会的分层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上升以及不同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激烈竞争，也造就了具有不同资本和行动能力的家庭。在本研究笔者对在A省H县实地调研的初步资料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主张在制度转型和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关系资源的动员和使用是造成农村内部高等教育机会分层的一项重要机制。农村社会传统的再分配精英新型的经济精英由于感受到了较少的经济压力，能够维持家庭内部的在家给予子女更多的监督与感情支持；而一般农民迫于经济压力，需外出打工，无法在家监督与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与教师保持经常沟通，获取更为充分的信息，从而监督与帮助孩子的学习；同时，由或很少接受与经历过学校教育，他们无法给予孩子一定的课业辅导也不知道如何同学校的教师进行沟通与交流；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在与教师联系时，习惯于求助“熟人”网络，这种关系选择偏好，得一般农民在保持与学校的联系上存在着一定的劣势，除去亲缘关系外，他们一般没有其他关系可以动用，由于教师在“熟人”关系网外，他们一般自我感觉没有办法与教师取得和保持联系，这使得他们交教师的联系偏少，也失去了监督、了解与改善孩子学业的机会。而再分配精英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家庭的家长则由于关系网络更为广阔，更有可能与教师保持一定的联系。

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如上机制，社会关系在农村居民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重要的影响力。布迪厄（1986）曾认为，社会资本是占据优势的阶层传递自身社会优势的重要资源，在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也提及：个体可动员的社会资本的量，受限于个体社会网络的大小以齐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存量。在针对不同类型资本相互转化的理论探讨也再次提及，社会资本的投资需要以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为基础向负。与此同时，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个体到底选择投资何种又有赖于在这种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各种资本所具有的价值。在本研究者认为中国独特的制度转型和文化背景，赋予了关系在教育机会分与，借助于在微观与宏观的综合分析，笔者说明了关系在教育机会分

配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在投资“关系”资本时所面临的优势与困境，透过这种分析，笔者探讨了布迪厄的资本时在独特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可能的实现形式。

从实践意义来说，通过对农村社会内部分层的现实以及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农村家长在教育事务上所面临的机会与困境的重新把握，本项研究提醒我们在设计相关的政策方案时（例如：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等）应当关注来自农村社会内部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长的声音。对影响农村社会内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动力机制的部分掌握，则使我们了解到不同的政策方案给他们带来的“得”与“失”。

### 参考文献：

- [1] 李秀兰：《谈谈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问题》[J]，《经济工作导刊》2001年第12期。
- [2]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3]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 [4]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5] 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 [6] 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J]，《鞍山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 [7] 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 [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9] 谢爱磊：《优秀大学生的成长之路：一种社会资本的新视角》[A]，见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 [10] 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 [1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12]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6–385.

[13]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4]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 95–120.

[15] Gold, T., Guthrie, D., & Wank, D. (2002).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Jiang, G. H. (2007). “Dangqian woguo gaodengjiaoyu nuxuejihui de chengxu chayi: a empirical survey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Jiangxi and TianJing”. *Xi-jiu daxue jiaoyu (contemporary college education)* (6), 57–62.

[17] Jingming, L. (2007). Gaodeng Jiaoyu Kuozhan yu Ruxue Jihui Chayi: 1983–2003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Gaps in College Access: from 1978 to 1993). In L. L. B. Yanjie (Ed.), *Zhidu Zhuanting yu Shehui Fengcheng: jijiu 2003 i de Quanguo Zonghe Shehui Diaocha (Institution Transi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Field on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18] Lin, 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3), 301–354.

[19] Nee, V.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ratification in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908–949.

[20] Postiglione, G. A. (2004).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inequality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M. E. Sharpe.

[21] Postiglione, G. A., & Ailei, X. (2009). Catering for the Market: China's Graduate Employment Problem. *China Cross Current*, 6 (2), 80–87.

[22] Schatzman, L., & Strauss, A. (1973). *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3] Spencer, G. (1973).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Bureaucratic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West Point. *Social Problems*, 21 (1), 90–103.

[24] Xiaotong, F. (1979).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 Xie, Z. X., & Luo, Q. P. (2004). “Ming, xiang, chuan sansheng shiyecheng gaodengjiaoyu jihui chayi de chubu diaocha” (“A primary survey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gap in Fujian, Hunan and Sichuan”). *Jiaoyu yu Jingji (Education and Economics)* (3), 3–6., 3 (3–6).

[26] Yang, D. P. (2006). “Zhongguo jiaoyu gongping de lixiang yu xianshi” (“Ideal and Reality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hina”).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7] Zhou, X., & Hou, L.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36.